

● 翻译研究

编者按:从生态学角度研究翻译,是胡庚申2004年首先开辟的研究路子。然而,生态翻译学的许多东西还有待进一步准确、界定。韩巍进一步界定生态翻译学中的重要概念“翻译生态环境”;以译者和译本并举的形式考察各种翻译行为并对翻译现象进行重新解释。李钢、李金姝运用描述翻译学的相关理论分析并诠释《论语》的英译本,进而洞见翻译中的重要原则和策略。

对“翻译生态环境”、“适者生存”的重新审视^{*}

韩 巍

(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 150001)

提 要:本文重新定义生态翻译学中的生态环境概念,重点探讨译者、译本、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此引起人们关注生态翻译理论的研究方法和发展趋势,使生态翻译理论避免进化论的局限。研究表明,从更加适合翻译研究的角度出发,选择性借用、修改生态学概念能够产生更多、更有价值的成果。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进化论;定义重释;翻译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3)01-0122-5

Reinvestigation of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 and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Han Wei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ranslator, translated text and environment, so as to reveal the possibility of eco-oriented translation study, explore the advantages of eco-translation approach and it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Through the revelation, it is desirable that eco-translatology will see the limitation of evolutionism, and will not only borrow suitable concepts but also adapt ecological concepts to the need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which way translation will benefit from its integration with ecology.

Key words: veco-translatology; evolutionism; redefinition;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

1 引言

自2004年胡庚申在《翻译选择适应论》一书中正式提出从生态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并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自然选择”思想作为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基础以来,生态翻译学吸引了大批研究者的目光,有支持也有批评。王育平、吴志杰则从理论基础、适应性和概念角度质疑生态翻译学的出发点,即以进化论作为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但并未完全否定生态学与翻译研究结合的可能性。(王育平、吴志杰 2009) 如果将胡庚申与王、吴2人的观点比照阅读,可以发现生态学和翻译的结合研究有创意并且可行,

关键在于界定生态翻译学中的重点概念和确定该理论的主要研究导向。

胡庚申构思的生态翻译学的一个优势在于,扩展翻译研究的视野,从生态角度观察译者主体性的作用,体现出文本多元化意识,也暗含未来的研究方向。因此在生态翻译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是“翻译生态环境”,而在这个背景下,以译者和译本并举的形式考察各种翻译行为并解释翻译现象是研究的重点。

与翻译的文化因素介入以及翻译与符号学结合研究较为类似的是,生态翻译学也引入了更为广泛的非语言环

^{*} 本文系黑龙江高教学会项目“翻译硕士(MTI)研究生的科技英语汉译能力的培养机制和模式改革研究”(HGJXH B2110303)和黑龙江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雅克布逊与巴赫金诗学理论比较研究”(12512005)的阶段性成果。

境。而较之前两者的独特之处是“生态”二字更加强调环境中各种因素各自的协调和平衡。前两者虽然引入文化和符号概念,但是还是更注重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对于翻译中各类因素的主观考察和结合运用以及策略筛选。而生态翻译学比较侧重译者主体与翻译实践中其他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整体环境对于译者和译本的影响。这一理论探讨的内容超越了关于翻译行为和译本质量,有更大的包容性,甚至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些在评论家眼中并不算成功的译本为何可以生存并取得较好的接受度。生态翻译无论是在译者和翻译环境关系上还是在译者策略选择上,甚至在评判翻译作品质量的时候都展现出了潜力。这一理论不依赖某一种策略和方法来约束翻译实践。它也允许主观判断的存在,并且对其予以合理化解释。

此外,值得学者注意的是,翻译不仅是关于文化、语言的一种行为。如果脱离经济、政治去看翻译研究中的一些命题是有偏颇的。因为随着翻译的发展,这门科学的外延越来越广,已经不能作为单一语言学科来考察了。而生态翻译学讨论了作为主体的人以及作为客体的环境,包括众多和翻译相关的因素在内,让翻译研究朝向更加系统的方向发展。

2 对翻译生态环境的界定

自从上个世纪文化转向以来,翻译与文化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吸引了学界的注意力。从近期的一系列翻译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中可以看到,文化已经成为翻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埃文·佐哈尔曾指出,“对于人类交流的研究,例如文化、语言、文学,不应把这许多因素当成独立个体,而是应该从一个系统的角度来进行研究”(Even-Zohar 1979: 287)。这一思想昭示文化和翻译在多元体系理论中的融合。在国内,文化与翻译结合的研究层出不穷。曾文雄在《论“第三空间”翻译文化资本运作》中,论述文化资本与翻译过程之间交错复杂的关系(曾文雄 2012)。朱安博的《翻译中的“同”与“异”之辩》也关注翻译中的文化冲突与融合(朱安博 2011)。而与生态翻译最为贴近的观点要数张从益提出的“致力于从翻译学、语言学、文化学、人类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展开的相关研究,关注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互动,努力探寻译学研究综观与整合的途径,从而构成翻译和合系统的有机整体”(张从益 2009: 94-95)。

《翻译选择适应论》明确指出,“生态翻译”理论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借鉴其中的“选择”、“适应”、“适者生存”、“生态环境”等生态学概念,作者并非完全照搬进化论中的概念,而是根据翻译学的实际状况有所修改。(胡庚申 2004: 2-4)但是,诚如王育平、吴志杰所指出的,此概念前半部分的定义合乎情理,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环境”比较相似,而后半部分则蕴含动态的、含主体性的

概念,与前面部分不一致。(王育平 吴志杰 2009: 135)就生态环境而言,它模仿达尔文的进化论来定义,其定义为“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胡庚申 2008: 91)。客体因素与主体因素同时出现在生态环境的定义中并非偶然,它显示了作者在对环境概念理解上与进化论之环境的矛盾。因为达尔文所研究的对象是以植物和动物为主的生物在形态上的进化,因此他所关注的环境是自然属性的。但是,生态翻译学所研究的是翻译中的各个要素及其行为,其中包括作者、译者、读者这样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研究对象。而他们的行为不可能与达尔文所关注的生物形态相比较,因此在借用生态环境的概念时须要对概念进行合理的改造。

翻译的主要实践者是人,并且须要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他/她的智慧和主体创造性。同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与其他译者、读者、原作者等因素之间会发生互动关联。因此,达尔文原理论中为了探讨生物生存而制定的物化性质的环境概念由于忽略了主体性因素,在生态学和翻译学结合的研究中显得有失偏颇。对生态环境重新审视后,笔者认为,不妨将“生态环境”概念视为和翻译有关的各种环境的总和。它下面有着子环境,即它不仅包含非生命的“自然”环境,而且也包含有生命的“社会”环境,可以是客体环境和主体环境的综合。其中,客体环境包含原文本、译本、文体功能、翻译策略、翻译规约等元素;主体环境则有译者、作者、读者、出版商、洽谈商、审稿人等元素。这两个子环境之间表面上相互独立,实际上相互关联。

3 生态环境与翻译实践过程的关联

翻译实践涵盖的范围很广,译者将源语言文字转换为目标语言文字只不过是实践中的一部分,要想让生态翻译学发挥其力量,能够对翻译行为进行系统的阐释,就要明确生态环境概念集所包含的子系统 and 主要元素,同时要对翻译行为进行阶段性划分,并根据不同的阶段来研究环境的作用效果。在翻译行为的最初阶段,译者如何选择所要翻译的文本或者出版商如何确定译者人选并商谈翻译事宜都对译本质量有着很大的影响。在译本形成之后,审稿人提出的意见,包括译本面市后评论家和各个不同受众群体的反馈都会影响译本的生存状态。因此,对于译者、译本的研究如果局限在狭义的视角,则会忽略诸多潜在的重要因素。由于翻译实践是在包括译者在内的多种元素的互动性过程中完成的,所以有必要把这一实践过程人为地划分为3个阶段,即译前准备阶段、译文形成阶段、译本生存阶段,3个阶段中物质性和人性环境所起到的作用也有所不同。《翻译选择适应论》一书之所以出现选择、适应、环境、译者关系不明等问题(王育平 吴志杰 2009: 135-138),主要是因为未加区分生态环境子

系统,并且对翻译实践过程未加详述,导致在不同翻译实践阶段中以译者为主要对象的观察研究无法有条理地进行,从而影响了整个理论的合理性。

3.1 翻译准备阶段

在第一阶段,即译前准备阶段,译者对原作的主观态度与主体间性都对翻译实践有影响,但后者发挥主要作用。译者与原作者的接触、与出版商意见的协调、对译本的目标读者的了解等人性因素会使译者和生态环境展开选择活动。并且最终意见达成必然是双向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译者“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结果。胡庚申提出的翻译第一阶段(环境选择译者)应该是在此种情况下产生的,但其“环境选择译者”的观点略显绝对,这实际上是一个双方选择的过程。因为毕竟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不同:生物不随环境进化,环境可以淘汰该物种,但译者不受环境选择,译者未必会被淘汰,也有可能开辟新的天地。

随着现代翻译以及译本商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作品不是简单的按照译者的意愿所呈现出来的。译本的诞生需要结合诸多因素,而在译前准备阶段诸多因素就已经开始介入。正如前文所言,如今的翻译行为有着较以往更多的目的在其中。可能包括宣传文化、建立形象、意识形态的传播或者是极为普通的商业行为。而无论是哪一个目的,都会在译者尚未翻译、译本尚未形成之前对译者实践和译本最终形态产生影响。显然,在翻译作品业已商业化的今日,资助人(也可能是译者本人或原著作者)推动译本出版的目的越来越多的左右着翻译作品最终的形态。无论是作品尊重原著,或是实行改写策略,或是在同化异化中进行选择,都更多地有着人为的作用。

当然,译者作为翻译行为的主体,也有着选择的能力。这一群体虽然一旦接受了资助者的邀约就需要按照既定的翻译目的来行事,但是译者并非一定要接受翻译邀约,并且即便在接受邀约之后也可以和其他主体共同协商来准备翻译前期工作。并且由于翻译中生态环境概念的引入,翻译实践摆脱了以往理想化的情况,即译者的翻译行为往往以实现语言、形式或文体等层面上的“对等”优先。而实际上,在前期准备阶段译者就已经很现实地明确了其服务的目标、要达到的商业目的或其他目的。因此,译者或被环境选择,也或对环境实施选择——叛逆、创新。因此,从这个角度着眼,译者正在发挥主体的特性,不断去适应也不断去改造翻译生态环境。打破了翻译生态环境的稳定状态,促进其发展。这也是译者和环境的双向适应和选择的意义所在。

3.2 译文形成阶段

在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及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和选择之后,翻译进入第二阶段,即译文形成阶段,前期准备时的种种选择和适应的结果会充分体现在译者身

上,并且通过译者这一完成翻译行为的主要因素而渗入到译本中。环境选择译文,环境制约译文所要描述的应该是此时的译者和译本以及翻译策略选择的关系,即这时的译者可以说已经能够体现,以至代表翻译生态环境来实施对译文的选择。但是,并非只是客观的环境会通过译者体现出来,人为因素也会影响到译者的翻译态度、操作以及译本的最终质量。并且,人为因素,如审稿人、赞助商和原作者的介入,从翻译实践角度看,未必要小于翻译规约、语言文化等物性因素的限制。

可以说,在这一阶段,译者作为各种因素协商之后的载体在译文过程中又将其中作用的因素通过文字呈现出来。而往往译者在翻译之中的选择并非语言层面的最佳对等,却是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最佳策略。或许译者为了建立某种意识形态而违背词语某一语义层面上的对等,也可以为了渲染美感而刻意改变句法结构或篇章布局。译者翻译行为开始以需求为指导因素,对忠诚、忠实的追求逐渐从必需转为量力而行,最终变为适度。

这一阶段是译者为主体能够最大程度发挥主体作用的阶段:译者虽然需要按照前一阶段定制的协议来采取相应的策略,但是在语言层面上无论是词汇选择还是语篇布局都可以决定。而这一点无论是在译前准备还是译本生存阶段,都是无法比拟的,因为这两个阶段中,译者和译本都会受客观和人为双重因素制约。

3.3 译本生存阶段

翻译的第三个阶段关注译本的生存状态,这一阶段和翻译适应选择论中的“适者生存”、“汰弱留强”相关联。但是,译本的生存状态同样不能离开主体性研究而进行,译本自身在语言、文化以及交际3个维度上的适应和选择固然可以影响译本的生存,原作品的口碑、译本的读者反馈、译评者导向、出版商的宣传力度等人为因素也会对其有很大的影响。并且由于缺乏对该方向的专门研究,译本自身的质量与人为因素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尚未可知,因此译本生存阶段是值得研究的。

译本的生存也是翻译生态环境作用最明显的地方,同时也是生态翻译学能够发挥最佳解释作用的地方。一些文本尽管翻译中有错漏或不尽如人意,但却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和众人的掌声,有的时候尽管令人费解,但是都有其存在的原因。在译者翻译阶段,通常会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而译。这与功能目的论有着相似的地方,但是译本是否能够真正取得预想的效果、达到预想的目的却超出了功能目的论的研究范围,而利用翻译生态环境译这一具有动态性的概念来解释却较为自如。以林纾译小说为例,林纾这种合作式并具有改写性质的翻译是译者主体的凸显,是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反抗。其译本在当时受到很多人诟病是不假,但其译本对当时人思想意识和对文学意识的启迪却与林纾译文的初衷相

符合。并且他违背了当时翻译的诸多准则,但却在翻译方面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功。乃至今日,虽然林纾的译本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远离了普通读者的阅读品味,但人们却发现了它的研究价值,从而吸引了一批从学术角度出发的读者阅读并斟酌和研究。

4 “适者生存”——翻译批评新导向

王育平和吴志杰认为,“‘环境选择译者’这一观点只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模糊化,未能使人们对翻译活动的认识有任何重大的突破与进展”(王育平 吴志杰 2009: 136),他们还提出了生物进化论是否适合翻译研究的问题。可以说,选择、适应和生存3个概念的提出引发了对翻译研究更深刻的思考,生态环境的概念也有助于翻译学的整合研究,因此进化论、生态学与翻译研究的结合是可能的。但概念的模糊没有突出生态翻译学的优势,使得众多聚焦在这一理论上的学者都还依然停留在文本以及译者主体性研究上。而生态翻译学恰恰应该是一个较为发散的学科,涵盖广、触及面大才是它的特点。它所关注的不仅仅是译者,而是应该以生态环境为背景对与翻译相关的多个要素进行考察,以此来解释翻译中的各类现象,提供理论上的阐释和实践中的指导。正如开篇所言,生态翻译学的架构蕴含了文本间性、主体间性、译者主体性以及译本历史的发展等,这些不但包含了翻译学的主流趋势,而且还体现了未来的研究发展道路。

生态环境与译本形成的关系是翻译学一直在关注的。在翻译准备阶段,对主要凸显出来的主体间性影响,有皮姆的翻译交易成本论模式对其进行全新阐释(Pym 1995)。同时,国内许多学者也就翻译的主体间性进行深入剖析,如张柏然、许钧(2005),陈大亮(2005),宋晓春(2006)等人,不但从哲学角度而且从翻译实践和文本分析层面研究翻译的主体间性转向以及主体间性对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影响。

在译文形成阶段,目前有很多研究以学术性、主观性方式关注译者自身进行的文字转换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语言、文化习俗等现象。引入环境因素能更好地体现当今翻译的人文关怀。迈克·克洛宁(Michael Cronin)最初将生态与翻译结合研究时提出,“我们在全球化的环境中进行翻译实践,然而却容易忘记关注本土的语言发展”(Cronin 2003: 166)。雪莉·西蒙(Sherry Simon)也指出,“翻译对现代文学影响越来越明显……它和创作有重叠的地方,它逐渐成为一种潜在的创作方式并且为写作提供灵感”(Simon 1999: 58-59)。因此,译文的形成更加呼唤译者超越文字,发挥主体性作用。

译本生存阶段体现翻译活动的最终结果,因此译本状态必然是翻译研究的重点之一。生存状态研究指向译文的多元化生存、译本的生存状态与受众群体关系、译本

与原文本在生存状态上的关系、译本与时间因素在生存上的关联等。在译本生存中甚至可能出现译本吸引超越译者(出版商、作者等人)原本设定的读者群体,对该种现象的研究能够帮助建立读者群体阅读行为和阅读特点的数据,对于翻译市场的健康发展、翻译理论的建构以及翻译道德规范的实施都具有积极作用。

然而,对译本形成的第三个阶段的研究却很有限,生态翻译学恰恰能够弥补这一缺陷。遗憾的是,生态翻译学的追随者们未能尽力去开拓这个领域,仅仅揭示选择和适应如何在译者的策略选择中起关键作用。如胡庚申提出译本多元化思路,但却一笔带过,没有深入分析。(胡庚申 2008: 48)这样的文本分析方法掩盖了生态翻译学的优势,将其变得和其他理论无异。生态翻译学应该双管齐下,不但要突出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主体性,而且要在生态背景下研究作为实践结果的译本的生存状态。

4.1 何为“佳译”

考察译本生存状态离不开认识“佳译”,但什么是好的译本一直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首先,要明确佳译不等于“唯一”。对于不同受众群体、不同翻译目的或者不同译本的使命,佳译的定义也各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在评定佳译中会涉及舆论导向、出版营销、原作流行度等因素。但归根结蒂,可以从译评群体和读者群体考量。前者的反馈偏向从专业和学术的角度论生存,后者的反馈则偏向从商业、审美及应用的角度论生存状态。此时,译本承载译者的种种选择和适应策略,并且自身还面临生态环境的选择。淘汰是相对的,所谓适或不适、强或弱,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也是生物界和翻译界在适应、选择、淘汰等方面的区别所在。

认识佳作,不妨回顾奈达对于译文评判标准的思考:“在翻译时,译者应该努力让译文和原文之间最大程度对等。但是,对等也分形式和动态两种”(Nida: 2000: 129)。正是奈达提出的动态观点对翻译评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它暗示批评译文要超越文字本身,要延伸到译文所处的环境。因此,须要在评判标准中将译评与读者考虑再内。同时,还须要兼顾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生存状态不能简单地从译本销售情况来判定,由于语言、体裁、时机等因素的影响,失落、被取代的译本质量未必要低于那些受到追捧的译本。如中译本普罗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和罗琳的《哈利波特》孰高孰低?如果仅从读者数量判定是不准确的。但是,忽视读者市场反馈,只看重译评同样会导致被翻译生态环境所淘汰。目前,翻译界对译本质量的判定确实过于偏重翻译理论,以至于脱离译本赖以生存的读者群体。毕竟译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满足某种需求,而这种需求更多来自于读者,而非译评者。其二,生态翻译学认为,“适者生存”这种观点表明对整体翻译环境的适应与译本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翻译

理论并非是生态环境的全部,因此只从译评角度(胡庚申提出的多维转换程度)评判译本的生存状态不全面,须要将“读者反馈”纳入生存状态的参考标准里。

生态翻译学对译本生存状态的研究的最大贡献可能来自于对不同评判群体的研究,打破学术和市场之间的隔阂,使翻译理论、实践和应用能够更好地整合,从而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

4.2 译本的多元化现象

在包含客体性、主体性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多数时候对译本的生存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市场和读者两个环境因素。因此,对译本生存状况的分析能够帮助翻译研究走出理论的真空,真正了解到在实践中诸多因素对译本质量的影响。

“汰弱留强”在译本生存阶段表现得非常明显,须要明确一点:弱与强虽然和译本的语言质量有一定的关系,但更多和需求相关联。往往多个译本的存在表明生态环境对译本的态度。对具有政治色彩的同一文本,不同版本的译文出现是各种势力之间博弈的结果。如《圣经》,每年都会出新译本,这些译本不但反映宗教流派本身的发展,而且也折射出译本的环境变化。因此,从生态角度来看,译本多元化是一个生态环境对译本的需求而导致的,而译本的作用就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在以环境为基础的生存研究中,观察不同时期译本的状态,能够发现该译本产生时期的环境状况以及为了适应该时期的翻译生态环境所作出的翻译策略调整。这种纵向比较对于翻译的历时研究有重要意义。有人考察《圣经》各个不同时期的主要中译本,按照时间顺序展示《圣经》翻译中遇到的环境因素对译本的影响以及在不同时期采取的主要语言转换策略,很好地揭示了宗教文本的翻译历史。同样,对于同一时期多元化译本的研究也能够体现主流翻译策略、思想以及为了不同目的、不同利益、不同读者群体以及译者或译者团体所采取的应对方法。此外,通过读者反应和译评反馈,可以明确策略与实际效果的相关度,从而将翻译理论和实践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5 结束语

生态翻译学从选择与适应的角度高度地概括了翻译行为的基本准则,对翻译研究以及生态翻译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虽然在翻译生态环境、适者生存和汰弱留强的概念中保留着进化论里不如意的地方,但它引导研究者关注环境、译者、译本以及译本生存状态等问题,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

生态翻译学的优势在于对生态的利用,让这一理论具有了灵活和流动的特点,并且带领翻译研究走出了以往诸多的二元对立情况。同化和异化可以同存,而对忠实和忠诚的追求也不必那么苛刻,可以变成忠诚度和忠实度的选择。功能目的和文化转向也可以融合在一起共同为翻译实践服务。以往对翻译单纯从语言角度的考量或从主体间作用的思考也可以更进一步拓展成为对主体自身、主体间以及主体与物性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让翻译从单一学术研究课题走向了更加现实的世界。这对于理论研究是一大进步,而对于翻译学这一实践性与理论指导交融的研究课题而言,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契机。

参考文献

- 陈大亮. 翻译: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转向[J]. 中国翻译, 2005(2).
-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 胡庚申. 适应于选择:翻译过程新解[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4).
- 宋晓春. 论翻译中的主体间性[J]. 外语学刊, 2006(1).
- 王育平 吴志杰. 超越“自然选择”、促进“多元文化”[J]. 外国语, 2009(4).
- 曾文雄. 论“第三空间”翻译文化资本运作[J]. 外语学刊, 2012(1).
- 张柏然 许钧. 翻译的本体论研究[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 张从益. 和合学途径下的翻译研究[J]. 外语学刊, 2009(3).
- 朱安博. 翻译中的“同”与“异”之辩[J]. 外语学刊, 2011(5).
- Cronin, M. *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03.
- Even-Zohar, I. Polysystem Theory [J]. *Poetics Today*, 1979(1).
- Nida, E. Principles of Correspondence [A]. In Lau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C].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Pym, A. Translation as a Transaction Cost [J]. *Meta*, 1995(4).
- Simon, S. Border Writing in Quebec [J].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1999(4).